

讨论意见

福谷 彬 (FUKUTANI Akira) *

我基本上同意中山学长(以下略敬称)的看法。近来我们常常能从媒体的报道中看到一些国家将芝麻大小的不毛之地奉为“神圣之”领土,并争得你死我活的情景。我觉得这其实是督促我们进行一些反思。

如果将领土争端的问题仅从相关地区的角度来思考,其实只需调节双方的渔业、商业等利害关系即可。但若将管辖移至几千里以外的政府所在地,问题就会极度上升到一个牵涉“核心利害”的层次。这种“核心利害”既抽象,又理念,且具整体性。仅从早年的古地图或文献的含糊记载中就认为这证明了此地属于自己的国家,并为之大喜之做法,实在是滑稽之事。若真要从学术角度进行解释,也需更为严谨的态度。

对此,我觉得诸位的回答非常有意思。尤其对于中山所提,“地域”取代“国家”的观点,诸位的反应是大致的方向能够理解,但并不完全赞同。对于这一点,我在最后还会提到,我认为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学术自由”。

我的专业领域是宋代思想史。宋代拥有中国思想史上独具特色的一面。即宋代是士大夫有“言论自由”的时代。

具体举例来说。宋太祖在临死之前,曾做石碑,要求自己之后的所有皇帝都必须遵守石碑上的两条准则。一是保全柴氏子孙,二是不得由于言论杀士大夫。柴氏是将帝位禅让给宋朝的后周王朝后裔。保全柴氏有保全宋朝正统性的意思。第二即是保证士大夫言论自由的意思。实际宋朝一代没有笔祸以及文字之狱,被处刑的士大夫也很少。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维系言论自由的思想是在皇帝独裁制确立的宋代出现的。“皇帝独裁制”这个词并非皇帝专政,而是指士大夫官僚做草案,皇帝决定施行制度。我认为正是为了维系皇帝独裁制,宋朝才保证了士大夫言论的自由。当然,这其实也证明当时已不存在任何威胁皇帝权威的势力。即这个时代言论的自由是维持皇帝独裁制,并证明皇帝权威的。

有人会将现代民主制度之下容许的“言论自由”的情况与皇帝独裁制确立之下,可称言论战的激烈党争进行比较。但这里其实暗含一个巨大差异。即宋代的著述、上奏文等即可成为言论,而现代的研究者有“研究的自由”却没有“言论的自由”。

我们要将自己的“研究”转变为“言论”不得不借助于媒体。由此,作为当代研究者捍卫“学术自由”时应注意的对象,与其说是政府等权力机关,不如说是媒体。至少在当今日本,对“学术自由”进行镇压的并非政府等权力方,而是引导舆论方向的媒体以及身处网络的普通大众所散发的流言。

媒体的危险性在哪里?比如广播节目中出现5秒的空白时间,就会被要求写原委书。对于当代媒体来说,不断发出信息已成为自身的目的。大众传媒的本质已不是传达事实,而变为传达本身。若某一事件发生,等不到事实确定,大众传媒就会将消息传出去,而信息的消费者们也不会等到那一刻。

值得引以自律的一点是,提供这些信息的往往是研究者。即我们有可能成为共犯。作为“意识产业”(Hans Magnus Enzensberge),媒体所提供给我们的是能够概括某一事件的便利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

图式，如果它能变为一些小的理论，那将更受欢迎。当然几天内人们就会将这些信息抛之脑后，但为了那一瞬间，我们经常会看到研究者的技能被利用。

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oseph Boorstin)曾在他的经典著作《美国虚构事件导论》(The Image: A Guide to Pseudo-events in America) (1962)中提出“媒体制造事实”的观点，而对于现代媒体而言，制造事实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观众也更认可媒体加工的，即媒体制造的事实，而非那些最原始的事实。

比如我们从旅行社的广告或导游指南中所刊载的旅游胜地中即可看到类似的倾向。又诸如一部分的社会学家在出现大事件时定会以一些关键词为核心造出一些新的理论，我觉得这种做法很有可能会与媒体陷入共犯的危险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的自由”究竟是什么呢？我觉得这是不为切合媒体的要求，任意甩卖自己的研究成果，并保持不屈不挠契而不舍的态度。与媒体要求不符的都是“不切合的实际”。而研究者的工作不正是阐明这些“不切合的实际”吗？

然而，若只是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那还是不够。更为重要的是积极寻求与这些不切合的实际进行相遇。我们要不畏惧在大规模的人力及资源投资下进行的现代学术研究，坚守自己的价值观，一点点收集传达真实的信息，并坚持共享这些信息，研究的“自由”正是在这些点滴的工作中实现的。

说到“学术自由”，人们总会自然趋向从政府保障的角度来思考。然而，我认为对于学术自由这一问题，从研究者自身的角度出发，思考其社会贡献，会更有意义。如果我们试图从现代社会中找出超越宋代的情况的话，我想只有在这一点上。

回到之前的问题，我认为对国家与媒体所提出的观点持警觉态度，并对此提出不同观点正是研究者的责任、研究的自由。